



辽宁教育出版社



I266  
193

# 风 土 小 记

文载道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土小记/文载道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2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5359-9

I. 风… II. 文…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0853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刘国玉 赵中男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林 林

**责任校对** 刘 璞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51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6 300 册

**定价** 7.00 元

# 本书说明

文载道，本名金性尧，1916年生，浙江定海人。现代作家、文史专家。早年参与编辑《鲁迅风》杂志，并在《文汇报》等报刊撰写杂文；后又编辑《萧萧》、《文史》刊物，为《古今》撰写文史小品。1953年进春明出版社，1958年起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后改名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编审。上海历史学会会员、作协上海分会会员。著有《文抄》、《风土小记》等。近年又撰写大量文史小品，结集出版的有《伸脚录》、《不殇录》、《饮河集》等。

《风土小记》由太平书局于1944年在上海出版。现根据这一版本重新排印，除个别排植错误作了订正外，一仍其余，并请作者撰写“重印后记”作为附录。

1998年8月

# 【目录】

## 本书说明

- 关于风土人情 / 1
- 千家笑语话更新 / 7
- 忆三家村 / 14
- 岁行尽矣 / 21
- 灯市 / 28
- 食味小记 / 36
- 故乡的戏文 / 42
- 夜读 / 48
- 谈入浴 / 54
- 茶烟小记 / 64
- 西湖旧履录 / 72
- 水声禽语 / 81
- 江村之夏 / 91
- 浮世草 / 101
- 冬心草 / 110
- 雪夜闭门读禁书 / 118
- 苏台散策记 / 128
- 忆家槐 / 140
- 忆若英 / 149

忆望道先生 / 160

我与书 / 169

跋 / 192

附：重印后记 /195

## 关于风土人情

今年的盛夏中，于病榻上看了一点记载风土节候之作，不禁深深的引起风土人情之恋，然一面亦有感于胜会之不再，与时序的代谢，诚有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民之感。有时一个人在孤灯相对，或午夜梦回时默想这已逝的流光，多难的万方，更加显出情绪的波澜万端，仿佛此身缺少了安排的所在。犹记羽璿馆主诗云：“瓶花妥帖炉香定，觅我童心二十年。”于是又陡然的将思绪驰骋于儿时的一刹了。自然，这样的一种感伤和枨触，恐怕不论古今中外，也正是“人同此心”，不过在此时此地，尤其易于感兴罢了。而且这跟见花落泪，对月生悲，遇见娘子当作“佳人”的“才子病”，似乎有截然不同之处。而这不同，也还是植根于各人情感的浮和实、真和滥的上面。所以杜少陵的城春草木之悲，李后主的小楼东风之痛，就成为俯视百代的绝唱了。

人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之中，往往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无言之恸，觉得俯仰啼笑，仿佛一无是处。而人类之配称得起“高等动物”者，其大半也正在于此。因此世上可悲而致命的病症，不论个人或民族，怕也正是麻木罢。

鄙人原是一个水乡小民，正是周黎庵君所谓“浙东之氓”。那边所有的交通供具，完全依靠于“乘风破浪”的船。虽然没有什么名山胜迹可以称道，但在明末清师入境，和鸦片战争外兵登陆时，也曾发挥过我民族的力量呢！不过现在所留下的旧迹，却早已荒芜剥落了。

说到土产方面，除了普通的蔬果之外，较著名的，只有在梅雨霏微时，颇有万紫千红之胜的杨梅，以及嚼来清脆利落的番薯。而前者的色味与形态，因为富于水份的缘故，更觉鲜美玲珑，值得耐心咀嚼，令人容易想起南国的荔枝，想起唐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名句。其次，为了滨海的原因，出产的自以鱼介为大宗。但因此也养成了我们的嗜咸腥的习性，跟湖南人的爱辣，苏州人的喜甜，或为东南人食性中的三种特征。而且我疑心这和三处的方言，未始不有点儿关系。但可惜年来由于交通的阻梗，有许多新鲜的海产，现在就颇难尝到。例如有几种食品如虾涎、望潮、面条鱼之类，最理想的食法，应该于网得之后即“就地正法”，则吃来方不失鲜腴之味，至多只限隔宿而食。这从“食不厌精”而论，即一般的食品，也应该以新鲜为上乘，不过对于水族动物，则愈“鲜”者才始愈“美”，似乎和黄酒之“越陈越好”者适得其反。近年来虽然叨科学的光，有冷气和罐头保藏之法，但较之原来风味却已减逊许多，倒不如索性乡下那样的借助于日光之力，曝之使干，以为时之需，而成佐酒或消闲之“绝妙小品”，不过外乡人却未必喜欢吃罢。

我有时想，食味的真正价值，怕不在于食品的本身，主要还在食品中的风土性和它的诱惑力，以及食时的情调，由此而引起食者的心理与情绪的配合，这样才称得到“享受”，而“生活的艺术”也备于此中了。知堂老人尝以住在古老的北京城吃不到精炼的或颓废的有历史性的点心，认为一种缺陷。可为上说注脚。又如在鲁迅先生笔下的叠满着酒甏的鲁镇酒店，于一角阴暗的破壁中，看到了孔乙己那样的人物，一面闻着刚刚煨就的茴香豆，则纵非陶公信徒，怕也未有不醺然欲滴了。如果碰着岁暮天寒，则白香山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诗句，无论如何要脱口而出了。同时我们也了解了刘伶的“死便埋我”的心理。但这与世纪末式的疯狂变态又有不同。还有如我们总

觉得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元旦饮橄榄茶，也比平日两样一点，无论在心理或兴趣方面——虽然味觉大抵差不多。如果我的说法，别人也有同感的话，那末，前述的食品的价值不在于食品的本身之说，也还勉强可以成立了。这原因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需要一点小小的变化而已。这是一种自然的要求，与方巾派口中的“良风美俗”固然牵扯不上，而于什么什么“家”笔下的“封建遗毒”，也有点殊途而不同归。

从上引的鲁迅先生小说说来，可见凡是泥土气息浓厚的作品，它的感人的力量也必深刻，卓然地显出其酽酽的人情味，正如我们听不自然的“国语”，远不如听无改动的乡音来得愉快，盖乱头粗服有时究胜于浓装艳抹，这也不仅仅省去我们的一阵恶心而已。

中国号称以农立国，全国人口中农民占十分之八。如果慎终追远的说来，则我们不只有猩猩的血液，而且还有农民的气息，对于一切乡国之爱，在后天的“教训”之外，一部分是应该算到先天方面去的。而对于故乡，长住的时节也许并不觉得怎样爱慕，但如一旦作客得长久了，却在在的易于引起关心亲切，所谓他乡遇故知，就不患三寸不烂舌无掉弄之处，实在胜过洞房花烛，或金榜题名。以我个人而论，每次到尝新入市的鱼介，慢慢的就会在记忆中浮起一个粼粼的影子，接着就波荡起来，于是我像驾着一叶征帆，顺流而下了。我自己知道是一个感情质的人，“喜怒不形于色”自分此生大概做不到的了。语云：“闻鼙鼓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可儿因某一的暗示而使哀乐的情绪特别发达者，虽对象不同，而兴比则一。这在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中，叫作物我同一的移情作用。但这里无讨论之必要；不过想从书上再找一个移情作用的实例出来，这便是著名的张翰秋风莼鲈的故事。据《晋书》（九十二卷）《张翰传》：

张翰字季鹰，吴郡人也。……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冏时执权。

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闲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执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著首丘赋，文多不载。俄而冏败，人皆谓之见机。

这看来跟陶公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有点仿佛。但事实上，自然为了“天下纷纷，祸难未已”，正是明哲保身之道；而且不失为魏晋人物的作风。所谓狐死首丘——他却连这篇《首丘赋》都懒得留下。这在积极的人看来，难免要说他是逃避现实，其实呢，正如知堂老人所说耕田的长沮、桀溺，并没有跟孔仲尼有什么大分别，所不同者，一个还在讲道，一个却不讲道而已。这种人在表面看来，也许十分的消极冷淡，但在他们的内心，又哪一个是饱经忧患，热泪盈眶呢！难怪五柳先生的笔下，写得最出色的，还是飞盖入秦庭的荆卿。羽璘馆主说得好，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骚。又说，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这确说出了陶公的心事。而张季鹰的看见秋风一起，便想到莼羹鲈鱼，以至命驾而归，主要固在于想得一个“首丘”，藉此向齐王脱身。但人在乱离之中，往往容易向大自然生出留恋之心，亦正人情之常。现在我们如果看到莼菜，就不免要想到西湖的山光水色，由山光水色而想起种种现状，于是“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的名句，又轻轻的起自我们心底了。

古人说诗是穷而后工的。我以为一切记载风土、节候、景物的著述，也以出诸遗民的笔下者最有声色。无论写景，记物，道故实，谈胜迹，虽然娓娓道来，却无不含着至性至情，成为“笔锋常带情感”之作。从前读过周译《域外小说集》中波兰显克微支的《灯台守》等作，至今还想到那个茕然一身，年迈无依，在昏暗屹立，碧海无际的夜塔中老人的影子！而最后还免不了飘流颠簸。波兰人热爱其故国和宗教，曾力图独立，故显克微支也

以这类荒凉冷酷，孤幼绝望者为题材，宜其紧紧的扣着读者的心弦。后来又读过叶天蓼的《甲行日注》，觉得每则寥寥数言，虽所写的多是流亡时的乡情野色，但触处牢愁，几无一而非麦秀黍离之痛。尤其是他们都是在热闹中冷静下来，在享乐后肩着艰辛，这时方始觉得甜酸苦辣咸，五味杂陈，而都须咬着牙根咽下去，真有谢枋得天地寂寥山水歇之概。一时觉得什么事都看得大彻大悟，百无牵挂。一时又觉得仿佛有一枚东西，时刻的在啮着他的心。这里且抄上几则来看看吧：

十七日(乙酉九月)乙丑，晴暖。宁初又来，云田园尚犹如故，室庐亦幸偷存，故乡风景则半似辽阳以东矣，但村人未吹芦管耳。

初九日(丁亥十二月)乙亥，晴。晚闲枯林戢响，斜月皎幽，东窗对影，一樽黯绝。颜子之乐自在簞瓢，予不堪忧者，家国殄瘁，岂能忘心？李陵所云，胡茄互动，边声四起，独坐听之，不觉泪下。

十六日壬午，晴，大风，冷。夜，风浪恬静，明月东升照薄纸窗上，如轻绡可鉴。远远闻吹笛声；虽地非山阳，而感同向秀，旧游之思，亦不止中散一人矣。

乙酉距丁亥已两年余，而拳拳故国之思，始终未减，令人肃然而又泫然。午梦堂遭陵谷迁变之外，其膝下的儿女，也半因困顿而死，集家国之恸于一身，真不复有生人之趣。然而这却已越出普通的风土记载之外了。其次，在明遗民中，这里还想起张宗子来。他的代表作自然是《陶庵梦忆》。其中所记虽为旧日流连之胜，或当时生活中的一肢一节，而琐琐写来，涉笔成趣，可称文情并茂转折多姿。内容虽不及午梦堂的声泪俱下，但如果先看一看《自序》，则似乎也不在午梦堂之下；所谓“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说不得梦矣。”换一种说法，人们在

“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之后，所留下来的，却是经过千锤百炼之馀的一种生的执著，如陆士衡所谓“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者是也。

张宗子的小品文，在明末中确可算得戛戛独造，别有天地，不同于时辈的浮佻纤靡。例如卷三《湖心亭看雪》云：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往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雪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三两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明末士大夫的享乐法，原是讲究而洒脱。上述的看雪云云看来或简单平凡，但一旦形诸笔墨，却感到清新风趣。比起当时那般巨绅达官的花天酒地，一塌糊涂的豪奢情形，陶庵毕竟要蕴藉得多了。而这些过眼烟云，在“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时的陶庵想来，真也成为一番“孽”，所谓“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非“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可了。我们如从这个角度来看，则《梦忆》中所记载的一切陈迹，似乎皆足以令人感到沉痛悱恻，感到低徊反复而不能自己，如他自己所说，如“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再说得迂旧一点，则世上最可悲矜的，也惟有“孤臣孽子”之心！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妨需要一点变化，一份享受，如行云流水，有纹彩，有波澜，有光，也有声。然而同时还有一个条件，即应该有节制。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放纵恣肆，就决非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末，还是让我们结束历史上的哀乐，而正视现实，认真做人吧。

(三十一年十一月先小雪二日)

# 千家笑语话更新

大地春回十万家，偏安原不损繁华。

先让我借用了郁达夫先生的两句诗，来点缀这一阳复始的“春”。在灯火青荧之中，我料理一番杂务，掸去两肩尘沙，让露冷风轻的露台，替当了意象中的流水小桥。仰看这一星如月，暮荫扶疏，更起了无限苍茫的登临之思。

“我们又长了一岁了”。而中国——也跟着地球翻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身。此刻长街碧天，一律沉潜无语。回过头，当我们默溯这骎骎而去的三百六十五日之馀，真觉得有万言千语，却又无从说起之感。而世局扰荡，人事升沉，陵谷迁移，又无一而非令人觉得“眼花撩乱口难言”，渺小如我辈只不过在尘海波涛中占数点湿沫而已。偶逢骇浪，即消逝无踪。然而风尚相传，必须“元旦书红”，才能“万事亨通”，当此一岁初临，似乎还是少说点感伤空虚的话；但浮泛的颂祷自然也无裨于事实。那末，无意伤今，且不妨专心道古吧。

到民国三十二年为止，中国已经有了两种历法：国历与农历，或曰阳历与阴历。不过前者虽“阳奉”而“阴违”，后者却“阴违”而“阳奉”。这究竟那一种较好那一种较坏，似不易于决定。大抵前者合于科学的准轨，后者适于人情之所好。自从国民政府取缔阴历后，也一度呈出雷厉风行之势，例如警察曾至休业的各商店，强迫其复业开门，并将元宝茶及供祀的果品，叱责捣毁，间有课以罚金者，甚至乡间售卖历本的小贩，亦一并捉去拘役。一时人心惶惶，将一个欢天喜地的新年，弄出啼笑皆非之

状。但这种现象，在一二年后即告消灭，此后则另外用了“春节”的名义，依然的回复到当初熙攘的气象中，以至于此刻现在；而当局也只好装作眼开眼闭了。可见“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但一面也足见旧势力之深入于人心，是如何的顽强不拔。学者如知堂老人等，也曾为阴历辩护，力主应徇合民情，但和令兄鲁迅先生则恰恰相反，因为鲁翁觉得习俗之难改，正足以觇示民族性的僵硬。这当如蔼理斯所谓人的心中有两个鬼在打架，一个是叛逆的鬼，一个是隐逸的鬼，在鲁迅先生的思想中，是叛逆的成份多，而知堂老人该是隐逸的成份多。这里恕我说得迂旧一点，他两人虽兄弟各异其趣，但都无碍于其“道体之本然”则一。

阴历据说创自夏禹，故曰夏历。不过杞宋无征，可疑多于可信。总之他的来源确是很古则是事实。《汉书·律历志》记唐尧纂修颛顼而订历，所根据者也只是传说。可是《尚书》中却有一段说得头头是道：“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命时。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官，众功皆美。其后以授舜，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这也只能予人以半信半疑，因为《尚书》中成问题处实在太多。所可信者，甲骨文中已有干枝纪日法的记载，则推至前一代的夏，或者已有历法在推行了。但变更历法的事，其实在古代也往往而有。如新莽时，大周金轮皇帝时，……几乎无代无之，不一而足，且多未能行之百年者。就是《春秋经》与《左传》所用的历法，也要相差两月。可见夏历的废革，原是“古已有之”。但亦有因此而闹出人命案的，如清初德人汤若望以客卿而晋叙光禄大夫且执掌钦天监印信，主张中国应用西洋历法。后为徽州杨光先所驳，并驳其选葬崇亲王日期之误，结果廷议汤若望及监官等八人凌迟处死，子弟斩决者五人。旋令若望免死，赦族人罪，止罪五人，于是仍废西历而用大统历。这也见得皇权时代

之淫威，因一亲王葬期之误，引出这个轩然的大波。汤若望以荣始而凶终，难乎其为“客卿”矣。

阳历与阴历，虽不妨因迎合习俗人情而并行，但对于某些具有统一性的事情，则必须有固定的规定。如旧历八月廿七日的孔子诞辰，及鲁迅诞辰等，现在均已统一于“国历”之下，深得通权之便。就是眼前的旧历新年，不论它的势力于民间如何深入普遍，然在名义上，却只能移“正朔”于“国历”，而别名之曰“春节”。至于一切纪念之类自尤须用阳历，与过去适得其反。收藏中有一份光绪三年（丁丑）的《申报》，注云“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即礼拜一”，距今已六十六年。中有《纪本年新正气象》一则云：

光绪三年自元旦至今已六日矣。连日以来虽寒气逼人，然天日晴明，较之去岁新正气象大有云泥之判。忆自去腊既望之后，风雨阴晦，少有举动，即须携盖而行，雪少雨多，而雨又不甚大。然道涂泥淖，行走维艰，已有十数日之久。无论富贵贫贱，终日愁闷，恐有风雨度岁之憾。至今岁更新换旧之时，恍似同治三年甲子岁景况。民间除饥黎困苦以外，其无偏灾之地，均可饱食暖衣，安居高枕，军务亦仅在玉门关外，又况屡经报捷，戡定亦必不远。今正如此气景，自必日佳一日。行见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必能年歌大有，岁庆丰亨，关外军务亦必一月三捷，不日即奏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之歌矣。较诸同治三年，不更见中兴之景运也哉？尤可喜者，去冬已遣使英国与其恩秘拉结好连和，今岁又遣使赴美国日本与其总统国君修好约和，合五洲之国同为一气，实属亘古以来所未有之局。日后再遣使往欧罗巴洲之法国与北日尔曼之普国，以及各洲之各国互相联络，更成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势。至于俄罗斯之与中国，本同在亚细亚洲之地，自昔往来者，更无论矣，呜呼，盛美如此，以视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之唐虞，何多逊焉？若夫众单于同时来朝，尊帝为天可汗之隋唐，更不必言矣。

新年“书红”，固免不了连篇吉祥话。但一考当时的“客观

环境”，就类乎痴人说梦了。盖事实上，中国那时正所谓积弱之馀强弩之末。滇甘之“回乱”方定，台湾之谈判方开，中英烟台条约亦于前一年缔结，而英王则在东方兼印度帝。至次年（光绪四年）左宗棠虽已定新疆，而琉球之并已迫眉睫，中俄伊犁条约亦成于崇厚之手。足见内忧外患，都丛集于先后，倾伏于四周，居然还想做什么“诞敷文德”的梦！虽说弃旧迎新之际，总得喝上几声彩，然而既无警惕奋励之意，又无哀矜勿喜之心，大家无非在混沌泄沓粉饰升平中敷衍日脚，终至于此后的更剧烈，更糟糕的甲午、戊戌、庚子等大变乱紧接而至，种下后日的贫弱颠簸之根。在度过六十多个元旦后的现代人看来，不知应作如何感想？

上述的这份《申报》期数为一千四百七十六号，距出版不过四年。查《申报》出版于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是年曾国藩卒，日本改用阳历），报式约纵横各一尺强，用竹纸四号铅字印，每页等于目前版式之一半。每期八页。以正月初七日出版者，前六日当为新岁休假，此风至今犹存也。前五页载正文，如论文、新闻、谕示、京报、简讯等项。后三页则全属广告，每页分四行，每行五格，即全页可容广告廿则。然亦有并二格而作一则者，如今日之以每行论值，地位视行数多寡而定。广告编排略如今日之分类栏，有药品、洋货、书籍、命理、拍卖、船期、机器等等。而“戏园”广告之地位则多出一倍。中有鹤鸣、丰乐、天仙三家（今日皆已改“园”为“院”字）。内惟丰乐专演昆曲。其所演戏目，有至今已绝响者，而伶人之名，亦皆“不见经传”，只三麻子尚能因“老爷戏”而想到。可惜我所藏不多，另外又只有光绪廿八年份一扎。不然，倒也可仿明清档案那样的整理出来，作中国近代史中最宝贵的材料。

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其所以能异于凡流，成为日记中之上乘者，就因其中颇多近代的各种掌故、秘闻、邸抄等的札

录，故有时亦可作野史看。我颇想选几则同光间的元旦日记来作一回“文抄公”，不料所找的几个元旦中却特别缺少议论和札记，如：

同治七年，太岁在著雍执徐，春正月，斗建甲寅。元日庚戌。晨，日出杲杲，旋雾，午后微雨。亭午始起，终日看书作字。生年四十，未有寂寂如今日者。夜，孝达治具相款。

同治八年，太岁在祝黎（黎亦作犁。尔雅屠维，亦作徒维）大芒落（亦作大荒骆，尔雅作大荒落，亦作大荒——均原注），春正月癸酉朔。自晨宓雨，至午后少止。见日景。旋复雨。予年四十有一年。晨起敬拜五祀之神，敬拜高祖以下像。终日读书。赏王元叩寿及叩新年一番金。季弟来，夜雨达日。

同治九年，太岁在庚午（岁阳曰上章，岁名曰敦牂），春正月（月在厉陬），元日丁卯，晴暖无云，天气和煦。昧爽起，祀门行之神。叩谒先像。偕季弟颖堂诣各房拜像贺年。

同治十年，岁在重光协洽，春正月（月在塞陬）元日辛卯。已初一刻雨水。中气微晴。阴寒。晡后有雪。予年四十有三岁。晨起祀门行户灶诸神。叩谒列祖像，复诣宗人家拜像贺年。群从叔父兄弟侄孙辈来。谢青芸总戎来。午诣宗祠，敬谒神宝，会宗人。何竟山来，不晤。晡，偕弟掷宋选图。夜书胜帖。

这四个元旦中，越漫堂绝少外出。吾乡习俗，元旦日多不出门，普通亲友贺年，亦须待诸次日。鄙人与越漫堂同属“浙东之氓”，或者皆有这种俗例吧？如同年初二日记云：“出门贺年二十家。”睹此而尤信。惟查娄子匡先生编的《新年风俗志》中浙江绍兴栏，所记风俗习惯，却未注明有此一例，但对越俗元旦祀神祭祖的情形，却颇为详细，与李君所记大致吻合。犹记白华《绛树阁诗集》中《除夕诗》云：矮烛杯盘慈母馔，小园伏腊野人家。惜全诗不能备记，但也颇得风土之胜。不过说到除夕诗，不待说，谁也忘不了两当轩的“千家笑语漏迟迟”的一绝，只